

資本主義文明的沒落

● 華倫斯坦

編者按：在過去五百年間，資本主義從西歐小部分國家的特殊制度逐漸成長為幾乎宰制全球的世界性體系。隨着近兩年東歐、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一個半世紀以來那麼緊密、雄辯、激動人心的資本主義批判似乎都已落空了，甚至有人宣稱歷史行將終結，認為世界發展已成定局。但是，華倫斯坦教授依然認為「資本主義文明已經到了它生命的秋天。……秋收之後，嚴冬就會來臨，那也就是……這歷史性體系的末日。」他經過三十餘年調查、分析、研究所得出來的這個結論所根據的，部分是經典理論的發展，例如資本主義不斷累積過程所產生的內在矛盾的分析；部分則是對當代資本主義運作機制，例如個人主義和他所通稱為「改良主義」的各種運動的深入解剖。這些分析的確能支持他的預言嗎，抑或資本主義將又一次顯示出人意表的變化和生命力呢？這是有待讀者細心探索和判斷的。

為資本主義算賬

《啟示錄》的四騎士

過去五千年間，人類創建了許多宗教。它們面對世上各種災難，致力慰藉受苦的生靈。在基督教意象中，這些災難可以用《啟示錄》中的四騎士，即戰爭、內亂、飢荒和瘟疫獸災

來概括代表。它們是破壞平安和喜樂的力量，在世難逃的劫數。資本主義的特異之處就在於它自認為能够在歷史中「超越歷史」，能够消弭本來無可避免的凶災，能够建立地上的天國。換言之，就是能克服「四騎士」的威脅。

它的論點其實十分簡單直接：資本主義增加了生產效率，所以大大擴充了整體財富；這財富的分配雖然未

*承蒙華倫斯坦教授同意，將他1991年11月19日及21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偉倫講座上的演講論文，節譯為中文在本刊發表，謹表誠摯謝意。

必平均，但仍然足以保證每人所得超過過往和其他歷史體系所能達到的水平。這說法有甚麼根據呢？支持者會說事實就是根據，看看這現代世界吧：它不是比以前任何時候更富足嗎？它的科技成就不是超乎想像嗎？人人的生活不都確實有進步嗎？更何況，那些最能接受和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不也正就是最富有、經濟最先進的國家嗎？這種以事實來論證的說法已經有兩百年歷史了，它對許多人是極有說服力的，因此值得認真檢討。讓我們倒轉四騎士的次序來逐一評價這說法吧。

資本主義文明是否消滅了（顯然它不能完全除滅）瘟疫和獸災的禍害？這是廣義的健康衛生問題。無疑今日先進的醫學，使我們已懂得預防疫病、治療病患者和建立公共衛生環境，遏制病菌蔓延。但資本主義的這本賬上有沒有其他事實呢？我們至少可以舉出三種屬債項的現象。首先，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膨脹，與它密切相關的運輸發展導致寄生蟲基因庫混合，由是產生毀滅性後果。美洲有三分之一以上本土生物因此滅種，大洋洲以及亞、非、歐洲的偏遠地區也有類似現象。其次，過去二十年的醫學報告證明，作為資本主義文明重要部分的經濟技術令世界環境產生變化，疾病種類實際上正在增加。第三，全球人口的驚人增長，很可能帶來了全新的疾病形式，有人認為這正是愛滋病（和其他免疫疾病）出現的主因。

醫學發展延長某些人的壽命，但寄生蟲基因庫的混合令不少生命無從出現。兩者數目怎能比較？目前這是算不清楚的，但最少我們要知道，賬目複雜而盈虧並不明朗。平均壽命延長大致是嬰兒死亡率下降以及六十歲

以上老人壽命延長這兩種變化使然。但是不知道活過幼兒期的人，會否比以前更能活到六十歲。至於會否出現新疫病，使整個數字發生變化，也難以逆料。不管如何，在抵抗疾病方面，資本主義社會誠然有一定成果，儘管這成果因地區不同而差異甚大。

在對抗飢荒方面又如何呢？飢荒的威脅比以往少了嗎？過去短期氣候變化會影響農作物每年的收成。現代科技進步，人類可預測氣候，許多地區的生產已不致受短期異常氣候影響。然而這種技術進展雖然使我們能在短期介入自然生態，中期而言卻起破壞作用。森林嚴重毀損，熱帶草原變成沙漠，人類不斷因此受害，而且影響長期的糧食生產。一方面是糧食總產量和生產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卻是極度扭曲的分配制度。對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特別是底層的五成至八成而言，這個制度只不過是以中期威脅取代了短期威脅。

內亂是否有減少呢？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運作要達致最優化，便得要求人們不斷遷移（有被逼也有自願的），以滿足特定地區的勞動力需要。這種遷移令世界的勞動力日趨種族化（因膚色、語言、宗教或其他文化因素分成不同種族），這形成了種族鬥爭的基礎，不同種族的上、下層以及下層中間出現無休止的爭鬥。每當世界經濟衰退（歷史上有一半時間是如此），衝突會變得尖銳，甚至惡化為暴力鬥爭，從小規模騷亂發展為滅族大屠殺。這種內亂在二十世紀有增無減，若是為這個世界體系算賬，這無疑是一筆大債項。

再看戰爭。所有制度都曾有過國家及民族間的戰爭。資本主義在此處再次顯出它是利弊兼備。死於廣島原

技術進展雖然使我們能在短期介入自然生態，中期而言卻起破壞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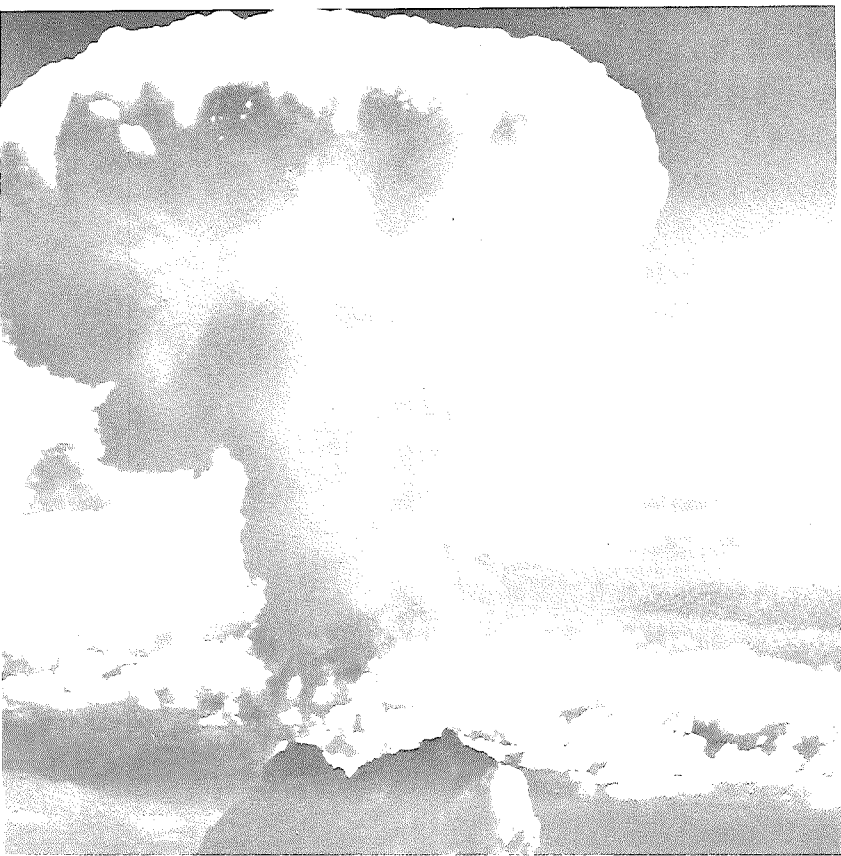
爆的人，比近代以前全部戰爭的死者還要多；亞歷山大橫掃中東時造成的破壞，也比不上波斯灣戰爭對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損害。

最後，我們不能忽視資本主義存在着物質財富兩極分化現象。若物質財富是指所有商品化和可商品化的物品，那它的總額增長確是相當巨大，儘管代價是大量消耗天然物資。得益者所佔的人口比例，遠超於先前其他制度。這個被稱為中產階級的階層很重要，但如果誇大他們的數目，那就大錯特錯了。在全球人口中，這批人也許從來不多於七分一。當然，中產階層往往集中在某些地區，在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中，他們也許佔公民的大多數。事實上，在現今這個世界經濟體系下生活的人，有多達85%的人生活困苦，水平不比五百到一千年前的勞動人民高，甚至有許多是更低。

資本主義文明真已打敗了四騎士嗎？最多只是部分（而且不平均）地打敗吧！至目前，我們只是着眼於量的角度，以下還須從質的角度論述。

在現今這個世界經濟體系下生活的人，有多達85%的人生活困苦，水平不比五百到一千年前的勞動人民高，甚至有許多是更低。

死於廣島原爆的人，比近代以前全部戰爭的死者還要多。



個人生活質素

首先要看物質生活質素，也就是超出生存所需的消費和享受。二十世紀的消費社會當然必須依靠科學新發明，我們有前人夢想不到的東西：電力、電話、收音機、電視機、室內水管設備、冰箱、空氣調節、汽車……。可是，我們也知道，在全世界範圍而言，分配是異常不平均的。

在關於個人物質享受的爭辯中，有兩方截然不同的評價。批評者指出世界上只有七分一人過着中產階級生活，他們的享受和窮人有天淵之別。擁護者則認為差距是相對的，比之五百年前，現今窮人生活已較好。數據爭辯屬於經驗層次，這裏涉及一個道德問題：即使這個日益擴大的差距只是相對的，是否就應該接受？

擁護者或許會說，以上這問題相當複雜，但資本主義還有另一個優點：在各地建立教育機構，數量以幾何級數增加。普及教育觀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新產品。兩個世紀以來，教育機構一直在增加，在1945年後尤其加得快。今天，幾乎在任何政權下初等教育都十分普遍，而中等及高等教育也有日漸增多的趨勢。相對而言，加強教育使人較易獲得高薪職業，但即使教育程度與收入成正比，教育的發展卻令僱主不斷提高對僱員的教育要求，於是在1990年完成小學的人所找到的工作，無異於1980年一個沒受過教育的人。

教育機構大量湧現，使所有年齡相若的人在日間都離開了家庭和工場。即使可能無需付學費，這個年齡階層的人不但不再能為家庭賺取金錢，反倒用去了家庭相當部分的收

入，於是，家庭被逼負擔起所謂「人力資本」的投資。在世界體系中，對大多數的家庭來說，利益是否超過成本呢？資本主義教育制度把人生重新劃分階段，在不同年齡階段有不同的要求，這一方面似乎使人更能發揮各種潛能，但另一方面卻縮短了「成年」階段，使非「成年」人不能獲得應有的權利。現代教育似乎已不能發揮啟發和提昇學生精神世界的作用，有些父母只視它為子女就業前的準備，而大多數學生則覺得它是負擔，寧願早日到社會工作。

群體生活質素

資本主義文明的擁護者認為它有兩個最大優點：普遍主義和民主。但正好相反，批判者認為它最大的缺點正在於欠缺這兩樣。正像賬目其他部分一樣，判斷取決於誰和怎樣來衡量。

普遍主義包涵了多個範疇，它認為有合乎理性、客觀、永恆——因而是普遍的真理：今天我們稱之為科學。普遍主義還認為有由某種自然規律決定的普遍倫理標準，因而有人人都應接受和遵守的社會規範：今天我們稱之為人權。普遍主義相信有客觀標準分配職位：今天我們稱之為因才任用制。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引以自豪的，正是這三樣普遍主義的東西：科學、人權及因才任用制。

過去五百年，培根一牛頓式的科學觀一直佔據着主導地位，認為科學就是不斷探索普遍規律，但它在科學界已受到強烈挑戰。挑戰者認為科學關於正常狀態的觀念裏，應包括混亂和極不平衡的開放系統，與及會導致分叉、無法預料但卻有條理分明的發

展方向的耗散結構。

資本主義文明不是滋養出普世適用的自由模式嗎？人權在法律和道德上地位高超，這不正是近代的發明嗎？無疑是如此。基本人權的普遍適用性和現世性，確實較過往的宗教跨前一大步。資本主義社會致力宣揚人權，使人權觀念被廣泛接納，可說居功不少。然而在現實世界人權卻屢遭踐踏。國際特赦協會很容易就可列出一張長長的清單，展示人權如何在各地受侵犯。難道宣揚人權只不過是偽善者的把戲嗎？

在某些地區，人權的狀況會較好。不過即使在人權記錄較好的國家，違反人權的事例在一些區域及階層當中仍是屢見不鮮。像移民就常被剝奪人權，而他們在人口中佔的比例正有增無減。然而這證明甚麼呢？明顯地，富國侵犯人權的案例，較在貧國為少。對部分人來說，這證明國家愈是資本主義化，則人權愈受重視，反之則人權愈受侵犯。另一些人卻認為，這現象只再次證明資本主義的好處只集中某些地區，並非惠及全人類。因此，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不但造成貧富懸殊，更使人權變成錦上添花式的獎賞，而不是普世價值。

科學和人權的普遍性既然都受質疑，資本主義的擁護者轉而提出最有力的一點——資本主義社會因才任用，使職位可合理地分配。

我們必須再看清現實與神話的分別。在過往的制度，個人也有晉升機會，而資本主義文明的特點在於，一，因才任用制被宣傳為一種官式德行，而不是簡單的事實存在。這背後的文化價值判斷標準是不同的。二，有晉升機會的人口比例提高了。但他們仍屬少數，因為所謂因才任用制只

富國侵犯人權的案例，較在貧國為少。這現象只再次證明資本主義的好處只集中某些地區，並非惠及全人類。

所謂因才任用制只是虛假的普遍主義。它宣稱機會平等，但就其定義來說，只有在不平等的條件下才有意義，因才任用制的本質其實是精英主義。

是虛假的普遍主義。它宣稱機會平等，但就其定義來說，只有在不平等的條件下才有意義，因才任用制的本質其實是精英主義。

此外，我們須找出採用因才任用制的機構有多大程度是據才能來評選。因才任用的評分法可輕易地選出小批非常傑出和完全不合格的人，但大批介乎兩者之間的人，用評分法來評選並不可靠。有清楚的證據顯示，家庭社會地位這時往往起很大作用。可見這種制度雖然能使少數人得到應得的職位，但卻讓更多人在因才選任的幌子下，以身分地位謀得職位。

人們認為，資本主義文明有另一個優點：培育民主制度，使其蓬勃發展。讓我們為民主制度下一個簡單定義：在平等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參與一切層面的決策。民主制度的基本動力是平等主義，而謀求特權及謀求能者在位則是它的反動力。這兩個反動力帶來了等級制度。

資本主義文明的擁護者說，它是歷史上第一個結束特權等級的制度。當然，他們認為才能的等級還是要保存的。批評者則說這是個大騙局，偽裝成才能等級制的特權等級，已廣泛出現在實際上應該遵循民主（即平等）準則的許多場合，例如工場和社區等等。

支持者認為資本主義社會較民主，而當今政治選舉制度相當普遍，正是有力證明。不過，有人卻懷疑形式上的投票權的實質意義。即使撇開這點不談，反對透過資本主義建立民主的人指出：在選舉制興起的同時，近代的社會公有制卻日漸式微，比對之下，失遠多於得。

這裏還涉及異化問題。資本主義的擁護者聲稱：正規教育的優異之

處，在於使學生發揮潛能。但異化卻恰是它的反面——是與自己的本性疏離，也就是無法發揮內在的潛能。在這一點上，保守和激進的批評者合流了，他們一致指斥商品化，尤其勞動力的商品化是如何違背人性。

現代社會出現多種精神及心理病態，正是人與自己疏離的具體事實。或許很難拿數據來計算，但我們可以指出三點：第一，現代確是有許多精神不平衡病態；第二，這些精神病與現代社會結構有明顯關連；第三，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這些病態正與日俱增。有人認為病例增加不一定屬實，可能只是現代人對社會各樣事情有較多監察和統計而已。不過根據實在的數字，我們可知道某些病態（如吸毒）確在增加。

此外，我們不能忽略樹木，忽略自然界。自然美景予人不少樂趣，商品化的發展卻導致大規模破壞生態。誠然，一些或許更好的人工美景出現了，但它們既已商品化，就只屬於一小撮人的，大多數人再不能隨意觀賞——像昔日觀賞樹木一樣。

究竟對誰有利？

從上述爭論，我們發覺資本主義的優劣得失顯然並不是一面倒。但我們能不能概括這些分歧的看法，整理出一條主線？我想是可以的。首先假定一點：我們從沒有黃金年代，歷史上所有制度都是體現特權等級的制度。既然如此，我們不是在好與壞的制度中間作抉擇，而是在較好與較壞之間取捨。資本主義與先前的制度相比，到底孰優孰劣？

唯一妥當的答案是：看它究竟對誰而言。資本主義顯然讓既得利益階

層的人口比率上升，對這批人來說，世界整體上比以前既得利益者眼中的世界更好。但世界上五成至八成半人口並非得益者，他們周遭的世界卻比以前下層人民眼中的世界差，儘管科技突飛猛進，他們卻是更加貧乏。同時，由於今日政府的工作效率提高，權力有更廣泛的滲透，他們實質上受到更多專橫的管轄。

資本主義造成一個兩極分化的世界，並且令世界不斷分化下去。那麼，何以資本主義可以歷久不衰？因為人們至今仍以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進行漸進改良，最後能消除差距。對資本主義的爭論，令這個期望大大增加。資本主義不單祇成功，而且使人對它抱有希望，連受害者及反對者也受到誘惑。

若你和我一樣相信所有制度均壽命有限，至終會被其他制度取代，那你定要假定現在的世界體系同樣不會永遠屹立不倒。接下去，讓我們看看資本主義文明的前景。

展望未來

資本主義文明已經到了它生命的秋天。秋天是一個美好的季節，至少在資本主義文明的誕生地是如此。經過了春花和夏葉，秋天是收穫的季節。然而秋天却也是落葉的季節。我們知道，秋收之後，嚴冬就會來臨，那也就是周期的結尾，歷史性體系的末日。

要明白一個體系怎樣完結，必須先了解它的內在矛盾，所有歷史性體系都有其內在矛盾（其實，一切體系莫不如此），因此，它們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三個

基本矛盾，它們不斷增加的壓力決定了資本主義的前途。這些矛盾是：累積的困境、政治合法性的困境和地緣文化論調的困境。從這個制度出現的時候這些困境就已經存在，它們都已發展到矛盾再也無法控制的地步。也就是說，要調整制度，使它繼續正常運轉，代價太過高昂，因此制度無法達到暫時的平衡。

累積的困境

資本不斷累積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根據和中心活動。但它的內在矛盾是怎樣的呢？

它的基本問題在於利潤最大化——也就是累積最大化——須要壟斷生產，壟斷的程度愈大，總生產成本和實際銷售價格之間出現巨大差距的可能性就愈大。因此一切資本家都謀求壟斷。然而高利潤是誘人的，其他人也總是想擠進這個市場。所以壟斷引起競爭，那也就打破壟斷和高利潤。每當高利潤減少的時候，資本家就會（單獨和集體地）尋找壟斷生產部門的新方法。壟斷的必要性和自毀性之間的緊張關係解釋了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周期性，也說明了為甚麼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中，在（高度壟斷性的）核心產品和（高度競爭性的）外圍產品之間會出現基本軸向分工。

市場上從來沒有實現過經濟壟斷。市場本身就是反壟斷的。優勢通常是暫時的，其他生產者為了自身的生存和資本累積，總會仿製優勢產品。由於不可能通過市場機制長期維持大規模累積，生產者必須依靠非市場因素。他們求助於兩個制度：具體的國家和無定形然而實在的「習俗」。

國家能創造條件，以壟斷銷售和

壟斷的必要性和自毀性之間的緊張關係解釋了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周期性，也說明了為甚麼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中，在核心產品和外圍產品之間會出現基本軸向分工。

壟斷生產要素的採購。最簡單的辦法是立法。然而這有兩種限制。一是它只適用於國內，而真正的市場存在於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以內。二是國家會受到很多政治壓力反對這種立法。施加壓力的是被排斥在外的企業家以及所有會受損的非生產者集團。因此，國家很少完全採用立法措施。作為一種長期累積資本的機制，用立法手段是缺乏效率的，所謂（現在多半是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正是這樣。比較常見是國家有選擇和間接地干預市場。國家首先是以國與國之間的方式、特別是以強國對弱國的方式干預，強行規定有利於自己進入市場的條件、最重要的是防止失去進入弱國市場的機會，同時使弱國的競爭者難以模仿提高效率的技術。干預的第二種方式，是透過預算、財政和再分配方面等手段，使個別生產者獲益，以對付一切競爭。干預的第三種方式是防止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的賣方打擊某些生產者的買方獨家壟斷市場的地位。

世界市場狀況、國際體系力量對比，和國家內部政治局勢經常變化，因此國家的具體行為也經常變化。在這些變化中，國家的行動很可能會使不同的生產者獲益或受損。從而不同的生產者對自己國家的態度也不斷轉變。然而，有勢力的生產者爭取國家提高他們在市場上的地位，國家的反應基本上是正面的。要不是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經常出現這種情況，資本主義文明是不會蓬勃發展的。

生產者還依靠「習俗」。習俗是無定形的，卻並非無足輕重。習俗塑造品味，創造市場。廣告和推銷明顯是習俗的產物，但那只是一小部分。在

五百年近代歷史中建立和完善起來的社會化機構，創造和培養出整個價值系統，才是關鍵所在。所謂「消費社會」，指涉的正是這個大框架。對個別（而不是其他）物品的需要，是資本主義文明的社會產物。各種各樣的制度從不同方面維繫和保證了這種需要機制。在此基礎上，生產者可以說服大批買主購買具體種類的產品。這無疑是建立相對壟斷的關鍵因素。

習俗還以更微妙的方式發揮作用。在語言和文化方面，有多種不同途徑使特定的經濟集團之間更容易打交道，而不是僅僅按照市場理性選擇打交道的對象。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實際運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區和家庭之間、親近和信任之間的聯繫。這雖然會減少業務費用，從市場角度看是合理的，但很快便會超過限度，變成「習以為常地」壟斷，而非由市場考慮決定。

總會有競爭打破壟斷。然而，因為國家和習俗都操縱市場反對競爭，競爭者也不能僅僅依靠市場。潛在的競爭者通常必須先採取行動改變國家和習俗，例如利用國家之間的矛盾：或者在國內建立政治聯盟以改變國策；或者介入社會，改變眼前的趣味傾向，甚至更基本的價值前提，以改變對習慣行為和預期行為的看法。

因此，累積方面進行的政治鬥爭是恆久戰，它不斷削弱保證世界經濟體系全面擴展的壟斷（不管削弱的過程多麼緩慢），而競爭又不斷加劇，這才出現孔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二階段（Kondratieff B-phase）的利潤縮減和長期停滯。每當出現這種停滯，體系就失去平衡。為了恢復體系的擴展和無盡的資本積累，必須有所調整。

有三種標準調整是可行的，它們

累積方面進行的政治鬥爭是恆久戰，它不斷削弱保證世界經濟體系全面擴展的壟斷：而競爭又不斷加劇，這才出現周期性的利潤縮減和長期停滯。

都有助於提高利潤的總水平，從而為世界性經濟體系重新擴展奠定基礎。一是降低有競爭力產品的成本。二是為有競爭力產品找新買主。三是開發新產品，這些新產品要能在相對壟斷的情況下生產，並且有廣大市場。每當出現全球性利潤縮減，都要作出這三種調整。

降低生產成本的一個辦法是減少投入費用，但是這也許會減少其他生產者的利潤。全球利潤總額也許還是一樣。更有效的辦法是降低人工成本——例如進一步機械化，改變法律或習俗使實際工資下降，或者到人工成本較低的地區生產。

然而這同另一種增加利潤(即使不是利潤率)的做法相抵觸，即增加有效需求。為了增加有效需求，勞動力投入的報酬總水平必須提高。如何協調這兩種需求呢？從歷史上看，只有一種辦法，那就是地域分離。在這個世界性體系裏，每當比較有利的地區採取政治措施提高有效需求(提高工資水平、社會福利水平或國家控制的再分配水平)時，其他地區就採取措施增加低薪生產者。後者採取兩種主要形式：使農村的不離土地的勞動者成為城市色彩較濃的、在一定程度上終生靠工資生活的工人；擴大世界性經濟體系的範圍，把大體上只能糊口的農村生產者納入變成新勞動力。

第三個也是宣揚得最多的一個恢復利潤水平的辦法當然是技術變革，創造新的所謂先進產品，使之成為壟斷的、高利潤的生產活動中心。這也要求國家進行相當多的干預，並且重新建立起「習俗」，以保證壟斷。

在積累的困境中——壟斷反覆出現，加劇競爭，導致利潤縮減；以及要用調節措施恢復利潤水平(因而

恢復平衡)——有沒有內在的限制使調節手段最終可能失敗呢？在技術創新領域，大概不會發現這種限制，儘管新產品也許嚴重破壞生物圈生態平衡。這種限制更可能見於增加有效需求的領域，因為它引發的政治行動，長遠說會在其他地方破壞獲利能力。

正是在第一種調整機制中(擴大低薪勞力)我們看到最強有力的制約，這個過程包含兩種限制：幾乎已經沒有還未納入世界性經濟體系中的新地區：前述的勞動者的儲備也將陷於枯竭。我們能不能用城市邊緣分子後備軍(這是世界人口中的一個增長得很快的部分)代替農村後備軍呢？也許能，但是前者對國家合法地位的威脅遠比後者大得多。

累積的困境把我們直接引入政治合法性的困境，後者也許是資本主義文明更大致命點。

政治合法性的困境

資本主義文明的合法性困境顯而易見。歷史上所有體系要能存在下去，就必須獎賞制度的核心分子，並且使物質待遇差、社會地位低的廣大人民群眾就範。通常辦法是武力加信念——相信統治者是神聖的，等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

有幾個世紀(大體上在十五世紀後期和十八世紀末之間)，資本主義文明認為它可以利用古代的合法性模式。這是主要通過君主專制建立中央集權國家以及建立國際體系的時期。這是造就勝利者以及在國際體系內部建立宰制秩序的時期。這個體系的核心分子由於同獲勝的國家結構建立密切聯繫而得到獎賞。

然而正像一百五十年以來人們一

有沒有內在的限制使調節手段最終可能失敗呢？最強有力的制約在於：幾乎已經沒有還未納入世界性經濟體系中的新地區：勞動者的儲備也將陷於枯竭。

再分析的那樣，資本主義文明正破壞人民的信念系統。唯科學主義(同技術革新的需要相聯繫)、國家結構行政機構化(為效率所必需)和大批人口有系統的遷移(以滿足資本主義生產活動日益增長的勞動力需求)，三者結合，要求大規模革新政治文化。法國大革命是這種革新的催化劑，它使人民主權觀念成為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新的道德根據。

怎樣繼續獎賞核心分子，同時保證多數人民的忠誠？人民，從理論上說，是政治合法性的主人。在十九世紀，這個難題表現為：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體系核心國家的國家結構(當時這些國家主要是在西歐和北美)，怎樣收編工人階級以及核心分子。這所以成為一個難題，是因為當時的絕對剩餘價值有限，如果工人階級報酬太高，給核心分子的報酬就會受到嚴重影響。這就是所謂的階級鬥爭，從歷史上說，這種鬥爭已經成功地加以遏制。

一方面核心分子要求愈來愈多報酬，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對國家的忠誠需要獎賞，協調的方式是讓工人階級分享一小部分經濟成果，它不足以威脅資本累積(由於這會擴大有效需求，也許甚至會擴大資本累積)，而且其數額還有希望隨着資本累積擴大而增大。

這種調整只有短期效果，而且有長遠的負面影響，因為它要不斷滿足工人階級增大所得數額的希望。然而在十九世紀，調整機制運行得非常好。在那個時期，核心國家的工人階級有兩種途徑可以增加報酬：一是在政治上參加選舉，或者緩慢而持續地擴大選舉權，另一是國家強制實行再分配，或者緩慢而持續地擴大社會立

法和社會福利工資。與此同時，還是由社會保證的希望(即所得持續增加)，這種希望不僅體現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中，而且體現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

到1914年，我們看到了結果——核心國家的工人階級很好地融入國家，既有愛國精神，又有改良主義色彩。這種解決辦法事實上並不妨礙核心分子擴大獲利能力，因為世界範圍的總累積增加迅速，而且大大增加了對南方的剝削。

第一次世界大戰削弱了核心國家對南方的政治控制。對這個世界體系的穩定運轉來說，國民的政治整合現在變得極為重要。十九世紀在核心國家內部趨於消失的政治合法性的難題，在二十世紀於全世界重新出現。問題仍然是怎樣向核心分子提供愈來愈多報酬，同是向群眾(現在是全世界的群眾)提供一小部分經濟成果和改良主義的希望。這種解決辦法就是我們所說的威爾遜主義，它所提供的是在全世界範圍內重複做先前在核心國家內部做的事情。威爾遜主義提出民族自決，這跟普選權相似(就像一個國家內部所有公民政治平等一樣，在國際結構內部所有國家政治平等)。威爾遜主義提出，要援助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這跟社會立法和福利國家措施相似(即世界規模的福利國家)。

這種調整最初似乎運轉得同樣好，終於導致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在1945-1965年期間實行政治上的非殖民主義化，由本土民族掌握權力。然而與十九世紀的調整不同，二十世紀的調整沒有得到，也無法得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地理方面進一步擴張的支持。因此到了大約1970年，除

十九世紀在核心國家內部趨於消失的政治合法性的難題，在二十世紀於全世界重新出現。問題仍然是怎樣向核心分子提供愈來愈多報酬，同是向群眾提供一小部分經濟成果和改良主義的希望。

非大量減少核心分子所得分額，否則已沒有資源再分配。從此，威爾遜主義一直在退卻。世界經濟的停滯是十分正常的，自從那時以來，在世界經濟停滯時期，先前從累積的角度談的一切常見的調整程序都用上了。然而這個世界體系用以維持民族國家的合法性的能力已有捉襟見肘之勢。

因此南方先前的民族解放運動、過去的社會主義集團的共產黨、甚至核心國家的凱恩斯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在政治上都垮台了，這接續地發生在二十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這些運動經過一個世紀的鬥爭而取得政治權力，現在因為群眾不再支持而崩潰。民眾不再支持也表明了他們對改良主義不再抱希望。這樣一來，也就減少了國家體系的凝聚力，並在實際上消除了它們在民眾心目中的合法性。然而如果這些國家不再有合法性，它們就無法遏制政治鬥爭。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左派戰略的這種垮台是一場災難，因為典型的左派戰略遠不是革命的，對資本主義文明而言，它反而是起融合作用的膠合劑。

地緣文化論調的困境

資本主義文明的基礎還包含一個以前從未凸顯過的地緣文化論調，即個人在歷史上所佔的主導地位。個人主義的問題是它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資本主義強調個人主動性，因此令自利意識成為它繁榮和進步的動力。普羅米修斯的神話推崇和肯定（包括投資者和工人）個人奮鬥，從而提高工作效率，激發創作精神。事實上，還不止此（雖然這點罕有人注意）：它也促成了集合個人而構成正規政治組織這個觀念：弔詭地這也就

產生和大大促進了反建制的運動。因此，即使是反個人主義的社會意識也是憑着集合個人能力和對這種行動有效性的信心來發展的。這效應造成了整體性的社會希望，從而成為維持世界性系統穩定的關鍵。

然而個人主義還有另外一面，即帶來困境的一面：它造成了一種全面的，特別惡毒和猛烈的競爭，因為它所肯定的，不單是少數精英，而是全人類之間的競爭；甚至，推到極致，可以說是無限的競爭。事實上，這種赤裸裸的自利心態氾濫開來以後對個人心智和社會所造成的危險正就是現代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重要論題。

因此，對資本主義文明來說，問題從頭就是如何調和把個人作為歷史主體的正反兩種效果。當然，保守思想家向來就認為這遲早會引來大難，社會主義理論家也無異議。但實際上兩者（包括他們推行的運動）卻從來都沒有認真地和這地緣文化論調鬥爭過。他們所致力於的，只不過是遷就它，或者企圖利用它罷了。

那麼這個內在矛盾到底是靠甚麼機制遏制的呢？靠的是同時強調，同時追求兩個截然相反的主題，在它們之間來回擺動。這兩個主題就是普遍主義和種族一性別主義：它們都是資本主義文明的精華產物。它們雖似對立，其實相輔相成。資本主義文明之能夠遏制以個人為歷史主體這一地緣文化論調所產生的矛盾，所利用的正就是上述兩者之間的特殊和微妙關係。

普遍主義的實質是甚麼？它所揭示的就是人類原則上應該有平等地位。這不僅是說人人有相同的天賦權利，而且說人的行為是可以觀察、分析的普遍現象。它對一切特權或部分

資本主義強調個人主動性，因此令自利意識成為它繁榮和進步的動力。它也促成了集合個人而構成正規政治組織這個觀念：弔詭地這也就產生和大大促進了反建制的運動。

人自命的優越性都不以為然。

種族和性別主義正好相反。它認為人生來並沒有相同的權利，而是按照一定生物或文化等級排列的，他們的特權、權利和在人類分工中的地位都要由這等級決定。它的根據就是不同種類的人表現有本質差別，有些人總是較優。

資本主義文明在過去五百年間最不尋常的地方，就是它對這兩主題始終保持強烈信仰，並且能夠同時加強兩者在社會上的實踐程度，使兩者有如亦步亦趨的孿生兄弟。其實，從個人主義的兩面，即作為能力、創作力、主動性的一面，和作為全人類永無止境互相鬥爭的另一面，就可以看到普遍主義和種族一性別主義這兩者怎樣從上述地緣文化論調的內在矛盾所造成的破壞性衝擊中產生，又怎樣反過來壓抑這衝擊。

一方面，普遍主義令人相信前述矛盾只是假象，因為事實上無止境的鬥爭能激發積極性，所以由之而生的特權是合理的：它是在均等機會下表現優異的結果。這種說法在二十世紀被尊稱為精英主義，它是資本主義累積過程中居高位者的道義根據。

另一方面，種族一性別主義則解釋為甚麼有些人跌到底層，例如即使有機會，他們也沒有發揮積極性，或者他們本質（即使不是由於遺傳最少也是由於文化）低劣，所以在無止境的全面競爭中失敗，等等。從賬目的角度來看，普遍主義為居贏面的少數人，而種族一性別主義則為居輸面的多數人，找到理由和解釋。

這兩種做法可以互相牽制，因為它們是彼此對立的：種族一性別主義可以防止普遍主義走過頭，成為平等主義；普遍主義可以防止種族一

性別主義走過頭，造成影響勞動力流動，因而妨礙資本主義累積過程的等級一種姓制度。我們所謂來回擺動就是這個意思。

但這搖擺的作用畢竟有限，因為對體制的要求不斷在增長，而原則上它們又不可能滿足——也就是說會由累積的困境引到政治合法性的困境。結果是要求實現普遍主義中的潛存平等主義的壓力不斷增加，而要求實現種族一性別主義中的潛存等級一種姓制度的壓力也同樣不斷增加。

因此，實際上，這兩種做法不但不能真正互相牽制，而且由於彼此排斥，分歧愈來愈嚴重。教育制度是推銷地緣文化論調的主體，而有關文化內涵的大辯論正好就反映了這種分歧。倘若學校要依循普遍性原則，那麼這是屬於部分人，即世界上層的普遍主義嗎？倘若它要依循文化多元性原則，那麼又豈不是反而在促進它理論上正是要克服的文化分裂嗎？假如人是歷史的主體，我們不是應當按才能分配機會嗎？然而，人的確是歷史主體的話，那麼社會下層的人，由於為了增進客觀工作效率而被剝奪了各種機會的，又豈不是應當再得到這些機會嗎？這場辯論已愈來愈變為自說自話的爭吵，而雙方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動員也日益加劇了。

歷史性體系的危機

現在讓我們把三者綜合起來。資本主義文明是在矛盾中發展出來的，這並不奇怪：所有歷史性體系都有矛盾。歷史上，資本主義有三個主要矛盾，這已經簡單討論過。至今為止，這些矛盾是憑調節機制遏制了，然而

普遍主義和種族一性別主義不但不能真正互相牽制，而且由於彼此排斥，分歧愈來愈嚴重，雙方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動員也日益加劇了。

機制本身也因此變得很緊張。這些內在壓力的累積表示現代世界體系本身將要甚或已經面臨一場體系性危機。

系統性危機所指的是系統到達了分岔點(bifurcation point)，或一系列分岔點中的第一個。所謂分岔點，是指系統遠離平衡點的時候，解決其不穩定問題的方案變成多重，而不再是單一的，因此可以說系統能在各種可能性之間作出「選擇」。這選擇既取決於它的歷史，也受系統結構以外各種因素當下力量的影響。在正常狀況下，系統並不受這些外在因素，即所謂「噪音」影響，但在遠離平衡點的時候，由於噪音隨機變化而產生的效應就會放大。這時處於紊亂(chaotic)狀態的系統就會以不可預測的方式重新組合，由是導致新秩序的出現。在這樣的情況下，系統通常會遭遇到一連串的分岔點，以至一個新系統，也就是說一個有相對長期穩定性的新結構出現，重又恢復在決定性條件下的穩定狀態為止。新出現的系統也許比前更加複雜，但無論如何和舊系統是不一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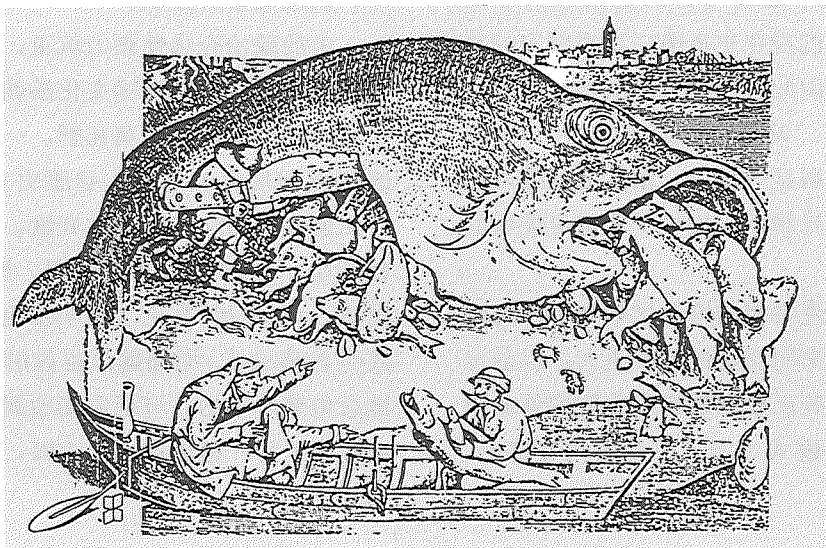
這個普遍程式對一切系統，包括物理、化學、生物、社會系統，都是適用的。若把它應用到我們當前的問題，即資本主義文明的命運上去，那

麼形勢大體上可說是這樣：作為一個歷史性體系，資本主義下的世界經濟已經相當穩定地依循本身規律運作了五百年了。我們為它算過總賬，指出了它在維持平衡所作的調整過程中所積聚的種種壓力，並且說明為甚麼我們認為它已經走到了分岔點。事實上，它似乎正處於要延續半世紀的連串分岔點遭遇過程之中。新歷史秩序的出現是肯定的，但這將是怎樣一秩序卻難以肯定。

具體來說，1968年世界革命的影響可以看作第一個分岔點，它一直延續到1989年的所謂共產主義崩潰，那是第二個分岔點。當然，1968世界革命代表了對資本主義文明以及它的主要支撐結構，即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霸權(蘇聯也在勾結這霸權)的一種反抗。但它也是對所有舊的反建制運動(諸如西方的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集團的共產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的否定：這些運動不但被視為缺乏力量、失敗，而且，更糟糕的，實際上為現存世界體系製造合法性。

對1968年的叛徒來說，改良主義、啟蒙價值觀和信賴國家結構作為政治變革工具這三者是同一套方程式裏的事物，同樣是他們所反對的。他

1968世界革命代表了對資本主義文明以及它的主要支撐結構，即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霸權(蘇聯也在勾結這霸權)的一種反抗。但它也是對所有舊的反建制運動的否定。



資本主義文明是在矛盾中發展出來的。內在壓力的累積，使這個世界體系面臨全面危機。

世界行將進入局部、地區性和全球性動亂，一個永無寧日的時期，它比起二十世紀美、德的大戰和其後的民族解放戰爭更為缺乏規律，因此更難於控制。

們反正統文化的旗幟並非像許多人說的那樣，是對個人主義的空泛認同：它其實更是對尋求自我意識的肯定，和對(相反的)自我中心消費意識的否定。

1968年的世界性事件具有起始分岔點的標準形式：社會情緒的動盪極度強烈：在資本主義文明中起了很大穩定作用的國家結構合理性第一次被打破，因而造成整體意識上的裂痕。當然，1968年革命的具體要求有些通過國家社會政策的調整而達到了，有些則遭到當局壓制。調整過程大多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核心地區而不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相反地，在勃列茲涅夫式的停滯局面下，1968年的要求是飽受壓制的。邊緣地區較少調整的原因是世界性累積過程使得它們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它們的政府全部在所謂孔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二階段中受到嚴重財政緊縮影響，因此無法用賄賂平息抗議。況且，這些政府本身多少正就是反建制運動的一部分，所以也就不太受到它的壓力影響。

然後，這些政府一個一個解體，被反覆的油價、債務亂局、貿易條件惡化等問題逼到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監輔(因而喪失合理地位)的路上去。這些政府中最後垮台的是東歐共產政權，它們現在也步第三世界國家的後塵了。因此，1989可以說是連串分岔點的第二站，它表面上和1968不同，其實基調是一樣的：由政府推動改良而在世界體系中獲得平等這可能性的幻滅。

共產主義的垮台比1968事件對資本主義文明穩定性打擊更大。以前可以把有些反建制運動的失敗歸咎於模仿蘇聯模式不足，故而有內在缺陷。

但一旦蘇聯模式也都垮台，而且是由內部失望情緒所造成，那麼社會穩定改進的可能性就顯得非常渺茫了。對列寧主義的失望其實正是對中間派自由主義的失望。現在前共產主義國家已被看成只不過是世界體系核心區以外的一部分。這第二分岔點的特色是它帶來了政府解體，但卻並沒有像1918年或1945年後的時期那樣，同時帶來民族非殖民化的樂觀(並且起穩定作用的)情緒。威爾遜民族自決原則雖然也許還有些作用，但肯定已失去魅力了。

那麼，資本主義文明向何處去呢？一方面，它的世界經濟體系自然會沿着老路前進——重建日本(多數是和美國合作)和西歐這兩個累積中心點。可以預見，到二十一世紀初它們會佔領了新的一些壟斷市場，從而大大擴展世界整體生產，但由於世界後備勞動力減少，它們並不一定能夠維持前此一樣的高累積率。

這擴展必然要令獎賞方式和社會結構進一步極化，而我們已說明這為甚麼會對政治合法性產生超負荷的壓力了。因此，世界行將進入局部、地區性和全球性動亂，一個永無寧日的時期，它比起二十世紀美、德的大戰和其後的民族解放戰爭更為缺乏規律，因此更難於控制。

由於政治合法性壓力沉重，和困境無從克服，遏制地緣文化論調內在矛盾的對進步的信念將瓦解。一般人既不再相信全能的個人是歷史主角，自然就會轉而向集團尋求庇護。這樣就產生了新的地緣文化論調，即「認同感」，它是用「文化」(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各種文化)那樣難以捉摸的一個概念包裝起來的。可是這新論調只不過製造了另一種困境：一方面，對多

重身分的認同等於承認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另一方面，它卻又必須承認所有「文化」的個別性，因此間接肯定了它們之間的等級。人依違於這兩種對立傾向之間的時候，對應於不同文化的集團之間彼此的界限將會不斷改變——可是「文化」概念本身卻是建立在這些界限穩定不變的假定上的。

這樣一來到處都會出現爆炸性局面。被排斥在目前的特權結構以外的人會開始從集團之間的不平等找尋政治出路。因此，在今後25至50年間，無論在南北世界都會有多種形式的動亂。就南方世界而言，在二十世紀顯得那麼重要的民族解放運動（姑勿論其好壞）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性任務，沒有人認為它再會有甚麼作用，所以大概不會重現了。取而代之的，將是二十世紀末湧現的三種出路，這可以分別稱為霍梅尼方式，侯賽因方式和船民方式，它們對資本主義文明是同樣有威脅的。

霍梅尼方式是一種激烈的變型，是整體地拒絕遵循世界體系的規律。當擁有相當資源的大集團採用這方式的時候，它對體系平衡可以構成嚴重挑戰。這種情況偶一應付也許可以（雖然也有不少困難），但倘若同時多處併發的話，就勢必會造成大災難了。

侯賽因方式大不相同，但是同樣很難應付。它是致力建立高度軍事化大國，實際上準備與北方國家開戰的途徑。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經過波斯灣戰爭之後，北方世界似乎輕易地就能夠對付它。但我們不要被表象迷惑：這條路成為愈來愈多國家的政策時，它就會愈來愈難對付。實際上，我們應當看到，即使徹底的軍事失敗，也還沒有在伊拉克本身決定

性地結束侯賽因方式。

最後，還有「船民」方式，這就是大批家庭勢不可擋地非法移居富裕地區，從南方湧往北方世界。雖說可以遣返船民，但這很費氣力，而且他們還會繼續湧來。在今後二十五至五十年間，可以預料有無數人能夠成功地從南方逃到北方。由於現實生活水平和人口差距，北方國家的任何對策都很難真正有效地制止這種遷徙。

那末經濟上仍然活躍的北方世界會怎樣呢？我們曾預料國家結構（包括在北方）的效率會下降。隨着人口平衡的變化，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經濟核心區將大量出現「內部第三世界」現象。目前北美洲的「南方隊伍」最龐大，西歐正在迎頭趕上，而甚至在北方國家中已建立起最堅固法律和文化壁壘的日本，它也出現了。

由國家結構變弱所引起的人口變化，將轉而削弱國家結構。社會動亂將再一次在核心地區成為正常現象。過去二十年間這往往被誤認為是罪案增加，但我們將看到的，其實是內戰增加，這是動盪時期的面貌。現在大家已開始在爭取保護了：國家無法提供保護，一個原因是沒有錢，另一個原因則是缺乏民衆認同。所以提供保護的將是大大擴張的私人軍隊和警察——由各種文化集團、各大生產企業、地區社團、宗教團體，當然還有罪犯集團等等僱用。這不應說是無政府主義：相反，它是有決定性的紊亂狀態。

新秩序的出現

這會有甚麼結果呢？從紊亂中會出現新秩序，所以只有一樣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資本主義文明將成為過

由國家結構變弱所引起的人口變化，將轉而削弱國家結構。社會動亂將再一次在核心地區成為正常現象。過去二十年間這往往被誤認為是罪案增加，其實是內戰增加。

去，它的歷史性體系將不復存在。除此之外，我們充其量只能夠用粗線條勾勒出幾種可能的歷史軌迹。至於體制的細節，則是完全無可預測的了。

從世界性體系的歷史看，將來似乎可能有三種社會格局。第一種格局是出現新封建主義，它將以更為平衡的形式使動盪時期的局面重現——一個分成細小主權體、高度自足地區和區域性等級系統的世界。這種情況也許能維持(但恐怕不能再提高)目前的高科技水平。無限的資本累積不再能成為這個體制的主要動力，但是它肯定仍然是一個平等的體制。它的合理性從何而來呢？也許要靠恢復對自然等級的信念吧。

第二種格局也許是某種民主法西斯主義。它將世界分成兩個等級階層，上層人數也許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它內部可能有高度的平均分配。這樣一個內部利益一致的龐大集團，也許能夠把其他百分之八十的人壓迫成完全無力反抗的勞動無產階級。這正是希特勒新世界秩序的構想。它失敗了，但那是由於在它的構想中上層人數過少罷了。

第三種格局可能是一種更激進、全球高度分散和高度平等的世界秩序。這似乎是三者中烏托邦色彩最濃厚的，但並不應當因此就被忽視。這種世界秩序已在過去多個世紀知識分子的思索中有過影子。現在已大大增長的政治和科技水平使得這種世界秩序的出現變為可能，但它並不是等於貧困的社會化，否則政治上它是不能實現的。

還有其他可能性嗎？當然有。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所有三種格局實際上都可能出現，而歷史的選擇則將取決於今後五十年間人類的集體行為。

無論選擇了那種方式，它都不是歷史的終結，實際上只是歷史的開端。在宇宙時間尺度上，人類社會仍然是很年輕的。

在2050年或者2100年，當我們回顧資本主義文明的時候，會怎麼想呢？我們可能會覺得很不公平：不管選擇了那一個新制度，我們也許都覺得必須貶低剛剛過去的制度，即資本主義文明。我們會強調它的弊病，忽視它的成就。到了3000年，我們回想起來也許會認為它是人類歷史上很有趣的一次經驗——一個特殊和反常時期，可能也是向平等世界過渡的漫長歷史中的一個重要關頭：或者，它本質上是不穩定的一種人類剝削形式，在它之後世界就回復到穩定的形式。這樣，榮耀就消逝了。

秉常 譯
羅奇 校

華倫斯坦(I. Wallerstein) 1930年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早期研究當代非洲政治與社會，1970年轉向研究世界體系，是首位發表世界體系觀點的學者，現任美國賓漢頓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傑出教授及范林保達(Fernand Braudel)經濟、歷史系統及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華倫斯坦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發展，有深刻獨到的研究，著作包括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1979)、*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1984)、*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1991) 和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1991) 等近十種，影響深遠，成一家之言。本文可以看作是華氏多年研究心得的簡明總結。